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八期 ——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2b)

【一家之言】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上)	芦 笛
【往事如烟】	大学回忆录——我对文革产生错觉	金 渝
【风云人物】	聂元梓印象	张 朴
【当事者说】	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	聂元梓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一家之言】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上)

• 芦 笛 •

那天老万（润南）对老蒯（大富）赞江青大惑不解，说江青那浅薄恶俗娘们劲，连当时的逍遥派或小爬虫们都瞒不过去，如何会令智商并不低的老蒯迷恋终生？他还谦虚道，大概只有芦笛的“毒眼”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云云。

其实这并不需要什么洞察力便能理解，在我看来，这世上有两种人：冻结的人和流动的人。老蒯、韩爱晶、老郑（义）、王（希哲）司令、刘国凯就是前一类冻结在西伯利亚的猛犸，而我等凡夫俗子则庶几可以算是流动的人。

这当然是文学比喻，且有违反坛规攻击网友之嫌，不过，舍此还真不便浅显明白地说清问题。我深信老郑等人不会和我计较，毕竟，用老马（悲鸣）的话来说，他们是我的“阶级弟兄”，大家都是“老子反动儿混蛋”，何况我并不是存心侮辱人。

当年读列主席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觉得里面大谈特谈的“唯物论的反映论”过于简单了些。列宁同志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感受看成了如同照相那样的机械过程，彻底忽略了人

脑中的“透镜”和“胶片”乃是主观制作的。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眼中的客观世界其实是主观加工出来的。大多数人只会看见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所以，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看来可以是一片光明，也可以是一片黑暗。

这就是司令、老郑等人至今还在坚持“人民文革说”。这和蒯大富至今肯定江青其实没什么区别。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老蒯比老郑、司令、国凯等人还要诚实得多。

人的一生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上，有高峰也有谷底。悲剧在于，人生常常并非广东音乐“步步高”，也常常不是在高峰结束的，于是心雄气傲的人常倾向于把自己的一生冻结在那高峰上，从此失去了智力发育可能，如同我家养过的那只僵了的小猫似的，再也不会长大了。

我看这就是发生在上述同志身上的事，也就是老郑说的“永葆青春”。只要在精神世界把自己冻结在一生的最高点上，自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也，其实这是很值得羡慕的一种活法。

现在来看老蒯，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不就是充任叱咤风云、左右乾坤的“五大领袖”之首的那几年么？如果否定了那段光阴，他此生岂不成了一团漆黑？而如果要肯定那段光阴，他就别无选择，势必得连带肯定把他亲手带到那眩目高度的恩公恩婆们。至于江阿姨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俗则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他是绝对看不见的。鬼子谚语说什么“Seeing is believing”，我看整个说倒了，应该是“Believing is seeing”，更准确地说应该是“*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believe to be there*”才是。这现象古人早就观察到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这意思，只是老祖宗一如既往地没能力说出发生机制来而已。

这点简单道理，我早在婚后不久就悟出来了。已经交代过，本人是匪婚党党员，受余大郎直接领导。婚后我常跟泰山大人说实话，弄得他非常 upset，后来我悟出这么做实在太残忍——告诉人家他那一生全花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祸国殃民上，流血流汗，亲力亲为，帮着制造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凶残的社会制度来，就算是说服了对方，你又让人家怎么活下去？这种残忍的事，也只有匪婚党党魁余大郎的大小舅爷大小姨们能干出来。

所以，那伙文革元老至今坚持“人民文革说”，从人道的理由看，我觉得是应该的。赞同他们的主张，应当视为一种慈善行为。

我觉得难以容忍的，还是阶级弟兄们的智力和出身实在不相匹配，连累我这狗崽子也跟着他们丢脸，这就是我想在《五一六通知》发表40周年之际，再咕噜一番轱辘话的原因。

吾党党魁余大郎那天作了个“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义，作为领导他的特首，我作了御笔朱批，同意发到县团级。不过，鉴于小帮菜们丝毫不知道昨天的历史，还得补充解释两句。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针对党官僚集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当然是为了权力斗争，把他心目中的威胁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是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是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是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明眼人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这其实也是许多民运朋友的奋斗目标——他们毕生追求的不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鼓吹的手段不也正是暴力革命么？这还能和毛有什么差别？正因为毫无差别，胡平同志才不顾起码事实，非要把毛那个超级理想主义者打成“犬儒”，而他们自己则当

然是真正志士。于是这新时代毛共革命和经典毛共革命之间的“无差别境界”，便神妙而方便地变成了“志士”与“犬儒”的“天渊之别”。

这些冻结了的同志心目中的“民主”、“解放”只能来自于红宝书毫不足奇，令人骇然的是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实，竟然只有我说出来，而我在指出许多“民运”人士其实不过是毛共余孽之后，竟然一度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既然有革命，当然就有反革命，伟大领袖想发动新革命，搞倒官僚党，当然要引来对方的反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就此一分为二，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革命派也就是所谓的“造反派”，而反革命派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换言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给日本军人宫本武藏的“大和魂”从头到脚劈成了尺寸基本相等的两半。

中央的造反派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以及敬爱的康老、谢富治等人，而中央的保守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干人，三位头面人物给打下去后，便是什么“四总四帅”那干老家伙们。人民的好总理则是“老子平常儿骑墙”，当时也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

这两大阵营之分，在九大特别突出：左派坐在主席台左边，右派坐在主席台右边，毛在正中，林彪在他左边，而周在他右边。按地理方位来说，周应该是右派头子，但摄影镜头却从周那儿取景，画面从周开始，将所有左派代表收入镜头，使用江阿姨最喜爱的“长镜头”拍摄。右派代表则只是惊鸿一瞥地掠过去，摄影师还专门挑老家伙们累极之时、七歪八倒瘫在座椅上的丑态拍，每逢此时，观众便报之以嘘声，如同过去见了国民党反动派似的。

地方也同样有这两大分野，党政军大员同样分裂为两派，各自效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幕后操纵革命群众，利用他们作炮灰，为自己打代理战争，打倒自己的政敌。两大派都誓死捍卫自己的后台老板，说他们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坚决打倒对方的后台老板，说他们是刘邓的反动爪牙。

从中央到地方，是参加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那决定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央首长，是地方首长，还是群众，参加造反派者多为不满现状者，在干部是宦途失意，在群众则是受过迫害或自觉受到不公待遇，而参加保守派的则是既得利益者，或自以为是既得利益者（后面这条非常重要，工农大众中自以为是既得利益者的同志特别多，凸显了本民族的愚昧）。

所以，在基层，参加造反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比较多，而参加保守派的出身比较好，多为中下级干部，过去的劳模，复转军人等等。但无论是哪派，传统的阶级敌人是断断不许参加的——那本来是人民革命，而地富反坏右资并非人民。

和毛共过去的革命不同，文革具有很独特的特点，最主要的一条是，它不是靠革命党来操控，而是靠伟大领袖的精神感召，于是它便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独一无二的革命，也就是“受控的自发人民革命”，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现象。

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强调过，早在上世纪初，列宁便发现，如同法国大革命那种自发的人民革命已经过时了。科技进步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镇压人民的优势，因此，新时代的自发人民革命绝对不会成功，必须由专业人士去制造，而这专业人士，便是集黑社会组织和军队于一身的革命党，这就是列宁同志的建党理论，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没有这一条，则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从空想变成可以操作的工艺。

从可操作性来说，即使没有统治者的镇压，自发的人民革命也根本就是不可控的，正如谁也无法控制雪崩或火山爆发一样。法国大革命的经典例子就不用说了，光看89学运就足矣：其实后期许多长胡子或不长胡子的老同志都觉得这么赖下去不是事儿，但柴玲、李禄等一小撮匪徒就是要死赖在广场上，而参加学运那么多人，竟然也就谁都拿那几个极端分子毫无办法。

据说老邓曾让老赵去试试他的怀柔手段，阎明复受命去跟学运领袖磕磨面头，想让他们在戈氏访华前撤回去。紫阳这儿的政治赌博的整个前提假设都错了——自发革命可不是他参加过的中共革命，根本就不是可控的，即使老阎说服了所有的学生领袖，那也什么鸟意思都没有，无非是制造出更极端的新领袖来罢了。可叹老赵顾问那么多，竟然也就没谁有这点常识，以致断送了卿卿性命。

因此，要使人民革命收发随心，控制自如，前提就是有个共党那种神经系统，把作布朗运动的暴民大杂烩变成可控的定向流体，用操控军队的方式去操纵人民，这才能达到革命设计家们的原初意图。

然而毛面临的难题却是对党自己开刀，很明显，他不可能再使用传统的受控革命手段，靠我党去率领人民大众进行新长征。这人可真是造反天才，居然想出“踢开党委闹革命”，靠造神运动为他制造出来的上帝声望，直接诉诸暴民，制造出那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来。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不能不让人赞叹其首创精神，他老人家当真是世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一个的伟大的犯罪天才。

如今许多人把那场革命简化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同志忘记了，权力斗争必然是任何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文革当然是我党内部最大规模、最暴烈的权力斗争，但因为这点就无视其社会改造内容，把它开除出革命队伍，那就绝对只能是毛共余孽“理论家”才能干出来的事。

悲剧恰恰在于文革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是如此，则哪怕是要砸烂全党，伟大领袖也能在短期内胜任愉快地完成那个任务——他只需动用枪杆子强行改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组织就完了。从单纯的权力斗争角度来说，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工作量比文革大到不可胜计：90%的党中央委员都给肉体消灭了，但靠秘密警察的专业队伍，这伟大任务很快就以高效率完成了，社会纹丝不动，丝毫没有引起党官僚集团的疯狂反扑。但毛如果那么做，就根本达不到教育锻炼培养广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为此他非得把广大人民发动起来，去投入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可。

这就是文革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它不是过去“民主革命”那种“运动群众”，具有浓厚的自发群众运动性质；另一方面，它并不按群众运动的自发走向进行，却始终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宏观调控”，严重偏离斗争大方向的言行立刻就遭到严厉制裁。

在文革中，全国党政机关都瘫痪了，代之以群众组织，但它们根本不是列宁党那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精英组织，而是类似西方议会政党的无比松散的全民性俱乐部。谁愿加入就能加入，想离开就能离开，哪怕是在武斗高潮中也如此，大家都是自发地凭兴趣玩票，组织对个体行动根本就没有控制力。下令“枪毙逃兵”的，全国也就只有王（希哲）司令一例。但即使在那极端例子中，该命令似乎也没有得到执行——就算司令能成立个督战队，那些人也只会是靠个人爱好，自发报名参加，自发踊跃杀人，要这种纯粹的志愿者去枪毙突然丧失武斗兴趣的战友，根本也就不会有人去执行。下这种无人执行的命令只能证明一件事：从年轻时代起司令就是个糊涂虫，一个人糊涂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糊涂，决不清醒，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既然如此，毛又是怎样对运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靠与过去的组织领导截然不同的“思想领导”，让毛思想直接与革命群众相结合。“两报一刊”定期发表的社论和不定期发布的毛的最新指示取代了红头文件，将毛的意图告诉大家，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们也三天两头接见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运动的大方向给予具体指导，并解决各部委和各省的重大问题，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乃是“毛泽东思想直接和群众见面”，没有一个官僚系统作为中转机构。

如果使用理工科干面包擅长的“理科思维”（也就是与文科绣花枕头们惯用的文学比喻毫无本质区别的“数理比喻”）来描述这种奇特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那么，文革类似于电磁场现象。伟大领袖是那磁体，不通过任何有形介质，就在真空中把磁场传播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之中，而八亿子民就如同无数指南针，根据那无形的磁力线调整自己的定向。

由此可见，这场革命受控的前提乃是参加者的高度自律性，也就是无数磁针们根据“毛主席革命磁力线”来决定自身定向的无限忠诚。从宏观上来说，虽然文革延时远远超出了伟大领袖的预想，但他靠自身的磁场仍然基本控制了运动走向，并没有玩火自焚，让这场自发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显而易见，如果造反派头子们如老郑、司令、国凯等人没有这种自发的忠诚，则运动根本也就不可控，这就是那几位冻结了的史前动物至今还在狂热歌颂的“趁机造反”的“人民文革”的实质。

说来好笑，文革颇有点像西方的两党政治。众所周知，毋庸置疑，西方两大政党都是松散的全民性组织，谁愿参加就能参加，谁愿退出就退出，根本没有什么组织纪律约束，两派议员都是人民代表，按双方同意的游戏规则进行文斗，根据这一游戏规则密切监控对方，一旦发现对方犯规便抓住大作文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营私舞弊现象。

文革初期也有点这种模样：全国分裂成了势均力敌两大派，虽然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反革命派，但两派在名义上都算“工人阶级内部”，并非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两派都严格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并以此严密监控对方，那游戏规则就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文革完全可以看成是“忠诚大赛”，双方比赛谁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正因为此，毛不但没有玩火自焚，他的威望反倒因这场自发人民革命空前提高了。西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政体的廉洁，而东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民间颂毛马屁文化的空前繁荣。

任何一个有点西方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如果毛是个有点起码深度的思想家，则据此不难摸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的独特道路来，那就是正式解散那个万能的共产党，只保留革命两大派组织，让两者竞选进入革命委员会，在忠于毛的大前提下管理自己。如此即能建立起一种马恩列斯从未想象过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这种新式的“人民民主”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美国南部邦联实行的奴隶制民主，或改革前的南非实行的白人民主，亦即只有一部分人民享有公民权，传统阶级敌人则被彻底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毛这么试验过，那是否成功另说，光这在理论上标新立异的摸索的原创精神就足以让他留名思想史了。可惜无论是从领袖还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种事都绝不会发生，于是毛便只能作为一个权谋大师而不是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毛的精神视野是由两方面的阅历铸就的，也就是在线装书的陈腐框架中填充了大量的权力斗争和革命战争经验，他最致命的知识结构缺陷是彻底缺乏西洋文明常识。如果说我的阶级弟兄们代表了毛时代的活化石，那么毛在本质上则是从24史中直接走入20世纪的秦始皇加黄巢。这就决定了他和儒家一样，把“分裂”等同于“失控”，天然热爱“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他最爱卖弄的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其实最不懂这所谓

“规律”。在他，“相反”决不可能“相成”，只能是“相斗相灭”，“对立”跟“统一”其实没什么相干，“一分为二”其实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对立消灭规律”。因此，两大派的形成不但出乎他的意外，而且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让他处于无限困惑之中，最后他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去强行压制派斗，直到临死，他也没能达到鬼子们中的大老粗高度，意识到派斗其实是可以被引入建设性轨道的。

从群众这边来看，从两大派对立进化为“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和伟大领袖一样，人民同样将“对立”视为“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最可笑的是，两派的对立其实是利益使然，但全国人民中竟然没谁意识到这点，却把它看成是什么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大是大非的原则之争”。而这就是文革“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前者是“道义大赛”，后者则是明火执仗的争权夺利。于是两派斗争就只能是比赛谁更“革命化”，而这抽象的“革命化”除了用直观外在形式表达对领袖忠诚（诸如“红海洋”、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之外，便只能诠释为禁欲主义。双方竞相“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其实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去人欲存天理”，使得禁欲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就这样，破天荒第一次，中国人民有了机会管理自己，但他们做到的，却是如同里弄小脚侦缉队一样，去管制自己和对方对毛的忠诚度，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虐水平。

尽管这场受控人民革命没有 backfire，让毛作法自毙，但它仍然以惨败告终了，在很大程度上，那乃是毛的个人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文革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模糊革命”，从发动者到参加者，竟然没一个人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后来的八九学运深得其真传，同为中国独有的政治人文景观。

我曾在旧作《革命理想越崇高越反动》中指出，人性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因此，一个社会理想越完美，也就越偏离人性，无视人性去强行实践这崇高理想，就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国际共运留给人类的教训。毛的文革瞄准的乃是最完美的社会理想，当然只能以造成巨大灾难收场。

更糟糕的是，那理想社会具体是什么模样，应该怎样建构，毛非但没有设计蓝图，而且连个大概其的念头都没有。此人是破坏天才，建设白痴，根本就没有制度建设能力，缺乏起码的智能，去把他心目中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模糊憧憬，翻译为世俗的实在的可行的社会制度。从 intellectual 的角度来看，此人的气质更像诗人而非思想家，对理想社会只有浪漫幻想而毫无建设性想象力。作为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在权谋，可惜这在建设中丝毫无用武之地，无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理论建设都如此。

说到底，毛的全部本事也就是发动和操纵群众，问题是，让群众起来并不难，但起来干什么？怎样才能建立起毛心目中的那个“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乐园来？到了这节骨眼上，对不起，伟大舵手自己也不知道，除了“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等零碎“新生事物”，他唯一能提供的就是谁都不明白其具体内容的“反修防修”口号，再咕噜上两句说出口后马上又收回的“巴黎公社”的零言碎语，那就是他的视野的天尽头。

就连革命对象他都没本事确定。过去“民主革命”倒没有这问题，对象就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革命对象都有简明的操作指标。帝国主义不用说，凡是非毛子的白人统统赶出去就是了；封建主义则是地产达标的农民；官僚资本主义更简单：凡是在国府任职而又拥有生产资料者统统雀屏入选。

新革命的对象据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麻烦出在那根本不可操作的定语上。一开初，这问题倒是好解决：造反派将它简化成了简易可行的“老当”——当权派，凡是作官的统统推倒，而这就是“一月风暴”的结果，所有的领导都在一夜之间“靠边站”了，而这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乱，如果毛的革命就是这么简单明确，那到这一步也就可以胜利结束了。

但恰在此时毛表现出他的叶公好龙的狐疑本性来。他既是走火入魔的浪漫主义者，又是精明入骨的现实主义政客。他知道造反派乃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当时的流行用语）的大杂烩，搀杂了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就是出身或成分不是那么清白的同志。尽管他们往往比出身好的同志还赤胆忠心，可他绝对不会信任这些人，觉得自己的基本队伍还是那些根红苗正的老同志。

于此，毛遇到了那个他始终无法解决的悖论：赖以发动推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不能信任，而他能信任的基本队伍恰恰又是反革命派。其实，如果他明确宣布一切党官都是革命对象，那问题就好办了，旦夕之间，所有的人都会变成造反派。但他又认为“广大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需要的只是教育而非打倒。这就是毛始终不敢宣布彻底砸烂旧的党国机器，重新塑造新的国家机器的原因。这种欲言又止的革命，用难听的民间俗话来说，便是“养半截孩子”——胎儿生出半截来，产妇便改了主意，不想再生下去了。

在这点上，他很像一个拔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上云霄去的痴汉：一方面，他对旧式革命制造出来的官僚机器深为不满，试图直接诉诸人民，把官僚机器砸烂重塑；另一方面，他精通并赖以发家的又是过去那套靠党去“运动群众”的战略战术，完全扔掉那套得心应手的统治机器，必然让他胆颤心惊。

毛解决这个悖论的办法，是去调和不可能调和的事，推出一个不良不娼、非驴非马的根本无法运转的怪胎来。他先号召“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最后发展为“军人、干部和群众三结合”。原来“靠边站”的老干部纷纷响应毛的号召出场，学习伟大领袖的榜样，争相打代理战争，拉一派保自己，去打倒政敌。

此时毛对革命对象的模糊“界定”便成了造成空前混乱的绝妙诱因，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坚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都可以指责对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都在同一个党领导下，那“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之争不过是几个月前才匆忙捏造出来的神话，现在愣要把一个党划分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说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说谁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还不明摆着是鬼话一通？

吵闹半天，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组织派系上，把刘邓死党清除了，但大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根本也就没有手眼通天的福。死老虎倒是容易扔下船去，但这并不能解决活老虎之间的权力斗争，于是政治斗争必然就要进入武装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所谓“吵得赢就吵，吵不赢就打”。

其实，就连毛本人也没本事裁决谁是走资派，这就是他为何始终认为两大派都是“工人阶级”的原因。中国政治斗争从来是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之争，如今革命领袖本人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鉴别敌人的标准，无法果断地把一方算成是该消灭的敌人。既然大家都是同志，不是镇压对象，则两派当然只可能像西方两党那样互不相下，谁也吃不了谁。可笑的是毛至死不悟这是他“敌我不明”的革命政策的必然产物，却始则为两大派的出现大惑不解，继而对无休无止的派斗腻味到了姥姥家，竟然连“斗批走”的伟大战略部署都提出来了。

至此，文革便从“群众受控自发推翻党官集团”进入“党内两派代理战争”的新时期，最后又因人民厌倦退出而蜕变为党内两派的角斗，直到毛死，这场持久战才算最终落幕。

增加这混乱的另一重大因素是军队，它是毛的“长城”，是毛敢放开让大众跳梁的定海神针。但他忘记了一条：军队乃是党官僚集团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已经说过了，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很不一样。苏联是“党造军”，先有党国，后建军队，将领们都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而是被政委监控的前沙皇军队军官。而中国是以军造党建国，靠军队开辟根据地，去创造出党组织和政权来，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所以，中共军队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很难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苏军根本不一样。共军高级将领同时也是党国要员，这和二战前的苏联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毛共没有单纯的文官，所谓“文官”自毛以下，不是转业军人就是兼职军人，白区党那伙人倒有点纯文官的模样，但那只是小头。从全局看还是军即党，党即军，两者根本就分不开。因此，奉旨造反的矛头也就决不可能只限于党政组织，迟早要冲击到与之千丝万缕的军队头上去，要清洗党官僚而放过大小军头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为了保证革命彻底，毛必须也清洗军队，但为了留下定海神针，他又绝不能碰军队。Once again，毛又一次遇到了无法解决、只能绕过的悖论。而如不解决老干部和军队问题，则他死后革命成果必然要被这些强人颠覆。可笑的是毛似乎始终没看出这点来，反倒去实行“三支两军”政策，使得军队得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地方权力斗争，以枪杆子为后盾效法文官打代理战争，使得两派武装斗争火上加油。

综上所述，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对旧式革命的幻灭，以及朦胧如梦幻的对人间天国的憧憬，便毅然发动了砸烂旧党国的人民革命，却因彻底缺乏政治设计能力，毫无取代旧制度的新政体蓝图，更因本人深刻的内心矛盾，使得他连具体的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连革命对象都无法确定，便只能试图以调和折衷的方式收场，却又限于极度狭窄的视野，不能用西式妥协建立新式政体，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梦中模糊天堂来，就连旧式革命改朝换代的成就都没有取得，使得文革从奋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进入人民为党内两派打代理战争的中期，最后蜕变为人民因厌倦退出代理战争、只剩下党内两派角斗的末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建设性政治家的惊天动地的无能。

细心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海外民朋鼓吹的新时代“民主革命”同样具备了以上特点：只有朦胧如梦的美好憧憬，毫无具体的天国蓝图，不但没有切合中国国情的施政纲领，就连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甚至连革命对象都不敢确定，只有本事喊大而无当的空洞口号。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具体措施，便是老郑“抓住贪官便杀”的豪情壮志，而这种公开践踏法治的不折不扣的暴民主张，就连老毛没敢在臭名昭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来过。中国的革命家们当真应了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

说文革在宏观上没有失控，是说它始终没有将矛头指向发动者自身。但从别的方面来看，因为在本质上是自发人民革命，文革也体现了不可控的特点，超出了发动者本人原来的意愿。

失控首先表现在“能发不能收”之上。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场人民革命，只有以革命党作为神经系统，以指挥军队的方式去指挥暴民，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收发随心。中共过去的“民主革命”和执政后开展的一系列的群众运动都是如此进行的：毛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就立即齐步走，再一声令下，则全国人民立即立定，当真是如臂使手，屈伸如意。

文革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毛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却迟迟不动，他不得已只好发动“大串

连”，让革命学生免费流窜全国，把圣旨传到草根百姓之中去。等到全国人民一哄而起之后，他再下令让他们停下来，却谁也不听招呼了，原定三年结束的文革成了看不到终点的持久战。

按他原来的“设计”（如果那也配称为“设计”的话），文革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也就是“斗倒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其大致构想就是在打倒走资派并在理论上肃清流毒之后，转入新制度建设。

但文革实际进程却始终纠缠于“斗批”阶段，从未进入“改”的阶段。这当然首先是革命对象含糊不清造成的，前面已经说过了：谁是走资派根本无法裁决，因而谁都可以是，谁也可以不是，这便给两派无休无止缠斗造成了“理论依据”（准确地说，是深如河汉的理论漏洞）。即使解决了这问题，那也不可能有什么郑重其事的“改”，因为伟大导师本人并无具体蓝图，怎么个照图施工法？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派虽然都无限忠于毛主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无视伟大领袖“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必要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光辉教导，把对立面视为必须无情消灭的阶级敌人。这本来也符合毛泽东思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既然自己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代表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当然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敌人不是？

因此，滑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两派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比伟大领袖本人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是伟大领袖本人想调和折衷和稀泥作乡愿，而 they 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如此纠缠下去，他老人家自然丧失了耐心，在与五大领袖座谈了大半夜后（那大概是他为时最长的接见纪录吧），他终于再度发现“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而群众组织并不能代替这革命党，以他上帝般的声望，竟然连几个学生娃娃都指挥不动。于是他便别无选择，只能将“斗批改”改为“斗批走”，派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将中学生统统赶到农村去，让大学生终于毕业。

问题是工矿企业职工没有“走”的去处，于是两派缠斗就只有靠人民大众丧失兴趣自然熄灭。在这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时断时续。到后期，工矿企业只剩下几个派头头还在跳梁，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假期。我已经在《纪念姚文元》中说过了，到70年代中期，我等广大工人屏息翘首以待，只等那几个派头头去冲击党政机关，立马就关了机器，载歌载舞地赶回家去，迫不及待地投入波澜壮阔的“男的学木工，女的学裁缝”的人民战争。

因此，文革是伟大领袖发动的永未结束的新长征。他把魔鬼从胆瓶里放出来后，便再也知道怎么收回去了。这场革命于是便只能以不了了之，了犹未了，如同排便不尽一般，造成三焦闭塞，憋得难受，不时要发作出来，不但在89年又全民发作了一次，而且革命火种竟然播散到海外来，至今犹有老郑、司令、国凯等同志“兴灭国，继绝世”，薪火相传，发誓要把那憋了回去的怨毒排出来，把流产了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全面胜利复辟的保皇派。这些同志当之无愧是比毛主席还要坚定彻底的革命派。

为这些同志至死不能接受的，是那么几个事实：

1、无论是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来看，造反派乃是为毛冲锋陷阵的新型党卫军，其斗争大方向基本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之内，毛对他们骨子里的猜忌以及在利用了他们之后加以无情抛弃并不能否定这一事实。

2、地方造反派和中央造反派属于同一政治势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者是前者的红后台，前者是后者的红小兵，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不能因为后来四人帮倒了霉，便连这铁的事实都要赖掉了。这就是我为何说蒯大富比我那几位狗崽子弟兄还要诚实得多。建议他们在为文革翻案的同时，也为伟大正副统帅和中央文革翻案。

3、造反派投身革命的主观动机，就是我那不成材的马弟弟说的“庶出与嫡出争宠”（这是该小子一生说出来的难得不糊涂的话语之一），无非是对红崽子们垄断了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权”而心怀嫉恨，因此拍案而起，去证明“老子比你更革命”而已（NND，“忠于毛主席”竟然也成了一种“天赋人权”，而狗崽子们竟然因为这神圣权利被红崽子们无理剥夺了而起来造反，当真是中国才会有的奇观），并不是出自什么后来追加的“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神圣动机。这一事实明明白白地写在老郑和胡平的回忆录里，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什么“趁机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云云，全是现在才追加的谎言。其实毛猜忌成性，最忌惮的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连《刘志丹》那种烂书都不能容忍，岂会任尔等那么干？

4、外国历史上的民主革命乃是争吃打闹引发的，无论是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还是北美独立战争，都是因为国王要收税、人民要誓死捍卫钱包而大打出手。因此，似乎可以说，“刮经济主义妖风”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但造反派争取的却是与红崽子们同等或甚至超过对方的忠于伟大领袖的“政治权利”。从头到尾，它都是一场政治斗争而非经济斗争。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争论只有那么一条：“你们是老保，我们是老造，你们保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狗，我们保的是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优秀革命干部”。这就是他们的“革命纲领”，就是他们的“20世纪XX公社宣言”，就是他们的革命的全部意识形态内容。他们的革命只给人民带来战祸、新式迫害和更加艰苦的物质生活，从未给人民带来些许物质利益。

5、为了证明自己比红崽子们还忠诚，造反派对传统阶级敌人更加心狠手辣，在排除斗争大方向的种种干扰诸如“经济主义妖风”、“翻案风”时路线觉悟更高，革命立场更坚定，更加重义轻利。一言以蔽之，这些弟兄们代表着共产主义流派中更极端的那一派，因而离民主也就更远，实质更反动。

6、造反派只代表了一半人民，他们的革命是针对另一半人民的毛共式斩尽杀绝，他们的民主是比毛共还结棍的“一半人民民主”。如果他们的革命成功了，起码要有1/4人民躺在血海中，剩下1/4人民将加入传统阶级敌人队伍，作为新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镇压对象。幸亏毛没有他们彻底决绝，制止了他们的革命，从客观上来说，这属于毛做的少有的好事之一。

7、若干造反派头子是终生不改的 religious fanatics（宗教狂热分子），只有肾上腺而没有大脑，最后便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唯美主义”者，奉行“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有运动就要去上窜下跳，根本不管那运动实质是什么。例如就其实质来说，“四五运动”完全是对文革的反动，是人民公开表示对中央造反派的否定和中央保守派的肯定，但竟然也有若干老造反混迹其间，全然不知那是在批判自己。在这方面司令最有代表性，他小人家至今意识不到，他那至今引以为傲的《李一哲大字报》和他贩卖的“两个文革”说根本无法捏弄在一起。

因此，我不能不痛心地说，我的许多狗崽子阶级弟兄们其实代表着中国人中智力素质比较低下的那一部分，心智不是很正常，而且终生没有长大成人的希望，尽管从私德来说，他们可以是老郑那种难得君子，也可以是国凯那种在夹缝中奋斗求生、值得敬佩的英雄。这当然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值得同情而非谴责，我在上面作的，不过是试图指出历史的真实罢了，当然，那也只是我作为局外人看到的真实。我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了，本人不相信“唯物论的反映论”。

文革失控的另一面确实值得肯定，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经济主义妖风”之类的真正的人民群众维权斗争。

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进步的短暂时期，我在《黑崽子》中指出：

“问题在于，当链式反应启动后，操纵胜利的群众就再不是那么轻易的事了。哪怕是毛那种终生玩弄人民的大师，也没那个能力让暴民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因此，压力一旦从普通群众转移到老干部头上去后，许多老‘阶级敌人’自然就‘跳了出来’。以往历次运动的受害人挤满了各级政府机关，要求平反；工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冻结了的工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样的福利；就连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了庞大的‘兵团’，要求为他们服役结束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经济补偿。”

用现代文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斗争属于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因而也才是真正的民主斗争。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组织的斗争，乃是“临造总”和“复转退兵团”，前者由临时工与合同工组成，其司令似乎是现在工党的方圆（不敢肯定记忆是否正确，请同志们去攻读《华夏文摘增刊》），那才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人家喊的也是流行革命口号，批判的也是刘邓路线，可那却是为了私利而非“公义”作出自己的诠释，争的乃是自身的实实在在的权益，那就是享受与正式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复转退兵团”（是不是这个名字可真记不住了，本人没有好总理的摄影式记忆力）则由全国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其奋斗目标乃是要求在城里的就业权以及增加复员费等等。

在我看来，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斗争，才是中国人民一直该干，却因被一代又一代蠢如鹿豕的知青革命家误导而始终未能干的正事。而这些正当的维权斗争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眼中钉，其中“复转退兵团”最能引起他们的恐慌——那些人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一旦成了全国性组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立即遭到了无情镇压。“临造总”的命运也大同小异。

无产阶级司令部取缔这些反动组织的理由是，他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爪牙，忠实执行了刘邓“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其目的是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自身利益上去，变成鼠目寸光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以此转移斗争大方向，让走资派逃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拳。

这指责其实也有一定道理：“经济主义妖风”是在1966年底—1967年初刮起的，其时全国党政领导普遍让革命烈火烧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实行“让步政策”，销财免灾，许多单位“老当”们应革命群众要求补发或增加了工资。但无产阶级司令部立刻就以其火眼金睛识破了这一毒计，在理论上加以痛斥，在组织上予以严厉取缔，使得这真正的民主斗争在短期内便烟消云散。

造反派最令人鄙视的一条，就是他们在镇压消灭这真正的民主斗争的过程中为毛作伥，正如89年学生们将涂污毛像的反革命分子扭送给公安一般。最可悲的还是，他们对那些“小爬虫”们大义凛然的声讨完全是真心诚意的。在红色恐怖降临前，许多狗崽子如老郑、胡平等人乃是积极分子班（团）干部旧主子，迫害起小芦那种落后分子来一点都不比后来的红崽子新主子们逊色。比起后者来，他们的毛著学得更好，用得更活，更精通那套“见义忘利”共党道德修炼功夫，因而比红崽子们更偏离自然人性，更倾向于鄙视那些“见利忘义”的“经济动物”们。

简言之，“经济主义妖风”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种表现，在我看来也就是那场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内容。不幸的是，这种健康趋势尚未来得及蔓延全国，形成气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时代的积极分子们在短期内合力扼杀了，因而在文革史上无足轻重。因此，从全局来看，虽然文革因伟大统帅胸中无数以及缺乏高度服从的革命组织，导致了无法结束的难堪局面，但由造反派主导的斗争大方向基本还是处在伟大领袖的容忍范围内的。

记得前苏联曾流传过一个政治笑话：“基督教相信死人复活，共产党相信给死人平反。”这其实就是咱们的“唯物史观”。

对咱们来说，研究历史似乎不是客观地查明史实，总结得失教训，引为将来的鉴戒，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政治需要，对历史人物作黑白分明的道义批判，给死人分别戴上“好人”“坏人”的帽子。这就是“否定”、“平反”等现代政治用语为何频繁地出现在讨论文革的文字中。

前朝遗老们反对“全面否定文革”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说那是一场“人民革命”。在他们的脑袋里，“人民”就是上帝，“革命”就是圣行。因此，只要证明了文革是“人民革命”，则当然就是只能肯定的伟大壮举了。

这种辩论方式，凸显了毛共党文化对国民智力的惊人败坏。这些同志怎么就想不到，只要是“人民革命”就是好东西么？那请问，中共的“民主革命”到底是不是人民革命？到底是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起来推翻统治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它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拥护和支持？

恐怕谁也不敢用“否”来回答这些问题吧。既然如此，这如假包换的“人民革命”，请问又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啊，如果遗老们要维护自己的“造反有理”论，只怕也得肯定毛共革命才是，这样一来，无论是老郑、是司令还是国凯，恐怕都得连夜修改自己的立场，改口痛骂先总统蒋公，歌颂大救星毛泽东才是。

如果不这么做，恐怕诸位起码也得修改自己的理论，不但要把“人民革命”划分为“好的人民革命”和“坏的人民革命”两类，得证明文革何以不是毛共革命那种“坏的人民革命”，而且还得告诉众人该吸取什么具体教训，这样才能在未来专门制造“好的人民革命”，不制造“坏的人民革命”，并预防“好的人民革命”一不小心恶变成了“坏的人民革命”。这才能向大众证明诸位确实有大脑，而不是区区在下恶毒诬蔑的只有肾上腺，是不是？

上网以来，我写的最多的文字大概就是反革命文章了吧，但收效甚微。这里面其实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人类社会的悖论：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一个社会总是不公平的，传统中国社会尤其如此，统治阶级仗恃手中权势，欺压剥削劳苦大众无所不为，把后者当成了任他们吞噬的绵羊。因此，当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掠夺的人民奋起反抗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只会持同情态度。后人读史时，也只会对那些奋起抗暴的英雄寄予高度同情，这就是为何革命家们永远不缺朴素正义感浓厚的愤青的支持，也是他们只讲义，不讲利，强调“抽象的绝对正义”的“第一原则”的原因。离开了这一条，他们便再也没有号召民众的本钱了。

可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当社会底层翻上来的时候，正是人世间出现最可怕的不公之时，令被

砸烂的旧社会的不公黯然失色。

今天鞍子说什么“草根不如贵族凶狠”，恰好说反了，乃是效法伟大领袖“颠倒历史”。

咱们也不用看远，不用看什么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也不用看外国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只需看看中共革命就行了：在中国历史上，谁也没我党杀的人多，哪个政权都没有毛共凶暴，在夺取政权之后还持续大规模杀人，而这残暴竟然不因长期统治而弱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很简单，毛天生是个造反派，和历史上所有帝王不同，坚决拒绝在执政后“从良”，处心积虑地要保持全党的暴徒本色，预防他们因执政而消磨了造反精神，刻意想把他们永久冻结在满脚牛屎的那个土匪暴徒阶段。这就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动因，也是文革初期何以出现令人发指的红色恐怖的基本原因：高干子女们根本不是传统社会那些贵族，而是永葆了匪徒本色的暴发痞子。在毛的努力下，毛共集团和历史上的暴发痞子不一样，长期拒绝完成从匪徒到贵族的自然转化。一直要到他死后许多年，自然趋势才开始发生作用，匪徒们逐渐开始向贵族转化了。这趋势持续下去，则新贵们迟早要变成传统社会或法国大革命那些柔弱的贵族，其凶焰因穷奢极欲而逐渐软化熄灭，为下一轮痞子暴动制造客观条件。

为什么草根造反的噩梦甚至比骄奢淫逸的旧贵族的统治还可怕？凡是脑袋正常的同志都该想得其中机制何在：人类社会所能做到的公正，就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这“权利”其实也就是分门别类具体界定了的“机会”。例如大家都有选举权，那不过是个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的机会，使用与否完全在你；又如大家都有投资开业权，这也不过是个在经济上逐利的机会，是否使用也完全在你个人。但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各方面的机会，不能因为某些人无法或不愿使用这些机会就剥夺人家的权利。

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建构原则。早就在旧作中说了无数次了：民主社会的基石是尊重个体人权，法治则是保证个体权利的具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契约，而狭义的民主（亦即票决）其实是和人权、自由相冲突的，乃是在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得已采用的妥协手段，只能在有限场合使用。最重要的还是法治保障了的人权（含自由在内，其实“权利”和“自由”基本重合）。

被革命推翻的旧社会的主要弊病，乃是统治集团或阶层把法律当成“统治者意志”，单方面制定有利于自己独吞社会财富的法律制度，以制度化的措施去掠夺人民。但在掠夺人民时，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威权设施只起到幕后威慑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统治者并不直接使用暴力，因此一般只造成百姓日益贫困化，并不至于造成大量人口丧生。换言之，旧统治者一般只掠夺人民财富，并不直接屠杀人民（苏共和毛共政权乃是历史上的特殊例外）。

人民起来暴力反抗统治者可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如文革生动证明的那样，革命的直接受害者其实不是统治者也不是反抗者，而是夹在中间的老百姓。武装暴乱必然造成大量无辜百姓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正如历代农民叛乱表明的那样。

这其实还不是最糟的。我已经说过了，任何革命或造反想要成功，靠乌合之众根本就不行，因为杂乱聚合在一起的暴民如同火山爆发或雪崩一般，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要使暴民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就得像孙武子把吴宫的美女们训练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勇士一样，使用严峻的军法，把暴民组织训练成令行禁止的军队，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彻底剥夺革命者个人意志的过程。当革命群众的个人意志被彻底剥夺、代之以革命领袖的个人意志之后，他们便被转化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机器人，以独裁领袖的大脑为唯一大脑。在革命队伍中，每个人都

变成了一个毫无自由意志的细胞，或者是肌肉细胞，或者是神经细胞，或者是骨骼细胞，不过是领袖个人的官能延伸而已。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如果同志们看了这解释还不能理解，那就请回忆一下好来坞烂电影中的烂镜头（记不住是哪幕烂电影了）：两个真人各自站在机器人的操作室里，操纵着机器人无比庞大的手臂去打对方，这就是列宁建党学说的真谛，如此建立起来的党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权颠覆工具，乃是人类最邪恶的发明。我党领导下的军民就是那庞大的机器人，严格按照站在操作室里的毛泽东的指令行动。

虽然共党革命是极端例子，但列宁建党理论乃是从历史上的一切成功造反经验的结晶出来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其一般原则其实是通用的。换言之，革命领袖若想以暴力推翻旧统治者，先得剥夺革命群众的自由意志，再使用这丧失了个人意志的革命机器，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到反革命头上去。谁胆敢反抗或不服从，就加以肉体消灭。这结果就是所有的人，无论是革命者、反革命者还是中立者，统统都丧失了自由意愿，最后剩下来的只有一个自由意志，那就是站在机器人操作室里的那个革命领袖。

（未完待续）

~~~~~

## 【往事如烟】

### 大学回忆录——我对文革产生错觉

• 金 渝 •

六月下旬到七月上中旬，工作组和校党团组织联手整学生搞得如火如荼。学生中间么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就是后来毛指控刘少奇“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就我的亲身经历，当时除了参与领导小组的学生干部在工作组的出谋划策下，踌躇满志地要彻底、干净地揪出一切牛鬼蛇神之外，普通学生，或者束手待毙、引颈就戮，听人宰割；或者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的立场问题和错误思想，接受组织的审查，以求过关；或者紧跟领导小组，积极实现领导小组的意图，对被揪出来的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使自己经受党团组织的考验，求得政治上的进步；还有一些人，怀疑自己就是被揪斗的对象，于是做出极其革命的姿态，高调揭发即出卖自己的朋友同学，要用人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同是一班同学，一边是惶惶不可终日，一边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这里需要补充几句。开始整学生以后，六月份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以及几乎所有的老教师并没有因此翻身。他们继续受到批斗，而且他们被勒令打扫厕所，打扫楼道、马路。美其名曰改造思想，等待运动后期作组织处理。教师的尊严和人格就是这样一落千丈，肆意地被践踏、被蹂躏。

大约是七月二十号前后，给我贴的第二份大字报出榜了，不过没有贴到校园里，而是降格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内容是针对我说过什么话（已无法回忆），反正大意与“今天天气哈哈”差不多，然而大字报的作者却一口咬定，这证明我对现实严重不满。以现在看，二者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革命时代自有革命的逻辑，既然“什么藤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反动阶级嘴里的任何话都是放毒，这叫阶级分析。因为我出身反动阶级，所以我的一切言论都是反动的。那一天明明下雨了嘛！所以“今天天气哈哈”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不满。谁敢说如此下结论是蛮不讲理？那就砸烂他的狗头。就此小小一例，证明文革时代人们如何中邪似地不可理喻。

我被揪出来了，会不会要批斗我？让我站在教室中间，垂手低头，周围挤满同班同学，愤怒地对着我举拳头呼口号，喝令我交代反动思想。如果走到那一步，我应该怎么办？我不寒而栗。我甚至想到哈姆雷特的话：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然而我得承认，我不是高贵者，我是卑微者。假如真的发生那样的事，我恐怕像大多数被揪出来的人一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不知什么时候起，“威武不能屈”“宁可玉碎不求瓦全”被毛的阶级斗争手段整成滑稽可笑的小丑的呓语了。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昏君或奸臣，而是被毛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不直接让你死，而至尽情地折磨你的灵魂，放肆地侮辱你的尊严和人格，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后再消灭你的肉体；而且还要让你的家人从此成为万劫不复的社会贱民，永远蒙受欺压和羞辱。

想到自己以后的命运，被揪出来的我时而愁肠百结，时而浑浑噩噩，以至于没有发觉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次被贴大字报以后，再没有我的大字报了。也再没有别的学生被揪出来。再后来，给学生贴的大字报陆续不见踪影了。再再后来，我又莫名其妙地可以参加学习会和讨论会了，甚至在领导小组的虎视眈眈之下，跟在积极分子后面屁颠屁颠的跑，“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没有谁告诉我我被整错了，也没有谁说以后不再算我的帐了，我也不敢问。

原来正在第三批右派学生将揪未揪之际，整个形势风云突变，变得扑朔迷离，进而令人眼花缭乱。

七月中下旬起，歌颂毛的歌曲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震耳欲聋。毛畅游长江的消息，以特大喜讯向全国发布，它在所有的报纸上占据头条通栏大标题，照片占整版。我心里疑惑，不就是一次游泳么？整这么大动静？又马上意识到自己确实是反动，居然没有感觉到毛畅游长江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报纸广播和所有宣传机器开口闭口是毛语录，后来又升级为最高指示。怪腔怪调的语录歌一再播放，不厌其烦地播放，终于使老百姓不得不承认，语录歌听起来优美悦耳动听。莎士比亚曾经诅咒金钱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其实何止金子？被垄断的媒体全天候的轰炸式的宣传，也能改变事物的面貌，使丑陋变为美好。

而且每天电台播放领袖的最高指示之前，一定要放送庄严雄壮肃穆神圣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音乐，把气氛制造的浓浓的，就像天神在空中巡幸一般。

七月下旬江青陈伯达康生忽然频频发表公开讲话，批评工作组，反对整学生。果不其然，揪批反动学生的事不了了之。我还不知道内部有指示，处理右派学生是暂停，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反正挨整的学生都如逢大赦，戏剧性地回到革命的怀抱，又可以开会和游行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发表公开讲话让我们收听。我心里疑惑，这江青凭什么资格和中央领导人平起平坐？她那“革命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的腔调我很反感。马上觉得自己如此想是大逆不道，因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是那么响亮！

很快的，我觉得江青不那么令人感到别扭了。因为她说，毛是反对整学生的。然后我又听到一系列的信息：毛提倡怀疑一切，毛还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毛甚至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大民主！啊！我爱听。

一切的变化源于下述背景：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这一宣布把所有的人都搞糊涂了。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于是乎，被揪出来的学生，不算数了。在当年我的笔记本上记载着：八月二日，我获准参加全系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誓师大会，我高呼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灯塔！”接着宣誓：“在今天庄严的大会上，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党宣誓，我永远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着！改造一辈子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边缘上拉回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脚印，是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是毛主席的声音惊醒了我，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个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自己头脑里顽固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开火！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我的头脑里高高飘扬！在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旗帜引导下，前进！请党考验我。”

几十年后我再看这样的话，不禁汗颜，不忍卒读！是狂热？是做戏？我问过几个同学，但是他们都回忆不起当时的场景，我也是。我们都患上了失忆症。若非白纸黑字记着，我真以为是我发昏的谰语。

很快从北京传来消息：出现了一种红卫兵，好似天兵天将，要把旧世界砸得稀巴烂，让帝修反牛鬼蛇神闻风丧胆。北京红卫兵的“三论”相继传到兰州，那就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27日）。随之，报刊电台亮出了毛和红卫兵的非凡关系。红卫兵当初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中学生自发组织的？还是毛和他的亲党背后操纵炮制的？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根据我所获知的资讯推断，红卫兵是北京的高级革命干部子弟自发组织的，开始恐怕仅仅是，他们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自己父辈的特权地位即将发生危机，所以本能地要显示优越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便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口号。因此应该说，这批干部子弟当时处在盲目和焦虑状态中。是毛亲自为他们明确了宣泄心中无名邪火的方向。

北京的红卫兵发起运动，他们抄家、打人，胡作非为。但是，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而毛的最新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成了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并发动总攻的理论。此后不久，毛泽东更是亲自接见红卫兵，他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一下子成为文革舞台上的主角了。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图穷匕见，矛头直指刘少奇。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六六年八月八日，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淋着雨水屏息凝神地听中央人民电台广播的重要文章比如所谓《九评》的播音员以无比庄严的声音宣读八届十一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宣布此前的文革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不是整学生，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我闻讯狂喜，我意识到我彻底的被解放了。我在大雨中手舞足蹈。啊！是伟大领袖救了我，我感恩戴德！过了几天，班级给我们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平反，党员积极分子向我公开道歉，我竟然是如此回应：我当众大骂这些被当枪使的同学“我不感谢你们这些混蛋，我感谢毛主席！”然后我歇斯底里地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多少年过去之后，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很难理解自己怎么是那样的德行，我感到很难为情。

难怪很多人不愿意回忆往事，难怪有些人要求在自己死以后再公布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不论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当时真是丑态百出。太丢人显眼了！中国人好面子，“丑事人人有，不露是高手”，人有隐私权，这自然无可非议。然而事关文革这样需要我们整个民族认真反思的历史，不回忆则罢，回忆就需真实。我赞成肖斯塔科维奇的话：“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情——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我把往事和盘托出，并非是因为我厚颜无耻，而是源于我对谎言和健忘的深恶痛绝，源于我对真实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执。在今天这个“权钱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生活本身似乎已无足轻重”的社会里，我知道我的回忆会使一些人不舒服，他们看到我自爆丑陋一定会很开心，但是我还是要硬着头皮回忆。

那几天，对我而言，真算得上是激情燃烧的日子。我福至心灵，茅塞顿开：原来毛反对整学生！毛指示说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可见毛和那些领导人完全不同。我暗暗思忖，毛老人家肯定是一直想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可是党内的人却搞官僚主义，所以老人家龙颜震怒，他痛恨官僚制度，憎恶专制压迫，他号召我们青年革命造反，实行大民主，实行巴黎公社普选的原则，这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毛要通过文革纠正官僚社会，实现民主。我要紧跟毛主席大干文化革命。

但是我对我的判断有没有把握。因为毛说的大民主，前面还有个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令人忐忑不安，半信半疑。而且这个人迷信，无论如何都是可怕的。回想文革开始以来，混乱的信息难以理清头绪。我竭力说服自己相信：毛是要通过文革建立民主新社会。我竭力说服自己：对牛鬼蛇神的暴力乃是群众运动的非主流现象，破四旧只是过火了，善良无辜的人遭受冤枉只是暂时的。中国的问题不采取非常手段，就无法拨乱反正。毛的文革就是为推倒官僚社会建设民主社会的非常手段。只要大方向正确，其他任何问题都是枝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怕砸碎坛坛罐罐。毛号召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多么豪迈！多么令我们青年学生热血沸腾！

我努力迫使自己相信我愿意相信的，也迫使自己忘记我不愿意相信的。我对文革产生错觉。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情接踵而至。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阶级敌人规规矩矩，知识分子俯首帖耳，人民群众悄然无声，全心全意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的领导一竿子插到底，整个社会被组织得井井有条，社会各个角落被管理得如同铁板一块，中央有号

召，地方和基层立刻贯彻，群众立刻行动，几亿人组织纪律性之强为数千年所未曾见。结果到六六年毛一发动文革，各级组织机构颓然失效，世界全乱套了。全国人民直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行动，也就是说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

【风云人物】

聂元梓印象

• 张 朴 •

—

还有多少人记得聂元梓是谁？四十三年前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在学校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

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聂元梓此时已四十挂几，仍被尊为中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连毛泽东也戏称她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我曾在照片上见过她：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在造反派圈里，她俨然坐稳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没声儿了。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羨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后来宣布她已病死狱中。

前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兴许能从聂的口中探出些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呢？

没想到，我的最终收获，竟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二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纟因）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三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在在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我跟聂元梓在一起时，几乎听不见她谈孩子。她的孩子们，竟没有一个愿意接纳母亲。当年她断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们也疏远了她。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什么都可以抛下，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四

在北大的最初两年，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提拔她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让她在全校作报告，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学程度，一辈子只读文件不读书，却要在第一流的学者面前大谈哲学，而她的“哲学”，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便所剩无几。在大庭广众下还经常丢人现眼，比如指责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在受陆平宠幸的干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赞誉为“五朵金花”。至今聂元梓谈到这五名女干部，仍是一脸不屑。失落、丢脸、嫉妒，折磨着她的自尊心。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决心的聂元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一九六四年七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她要让陆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当然，聂元梓不是在单纯的报复，她的揭发更像一种姿态，向高层权力斗争的赢家表示：我是你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到一九六五年初，聂元梓对陆平的攻击突变凶猛，原因是她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她的揭发已受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注意。

但聂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泽东此时仍举棋不定。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象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她还不太绝望，毕竟她是女人，一个在老年男人眼中还算年轻的女人。

五

对男欢女爱从来就没兴趣的聂元梓，这时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六十七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尽管吴溉之的儿女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反对，毕竟丧偶多年，孤独的吴溉之无论心理还是生理，急需着异性伴侣。

既然是利用，也就谈不上感情，聂元梓把她对吴溉之的心态，定义为：尊重。你听她描述吴溉之，总是少不了这样一些话：一九二四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县苏维埃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住三进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卫加工作人员，等等。最令她心动的，还是吴溉之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密切关系，安经常到吴家打麻将。安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她的调动，而且，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助她仕途腾达的渠道？

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安子文又有情妇邓觉先挡驾，她根本无法靠近。邓觉先虽年近五十，风韵依存，抹红嘴唇，穿高跟鞋，这让土气的聂元梓相形见绌，能不憋气？当时跳舞成风，邓觉先又爱夸耀，声称来请她跳舞的老干部的轿车在她门前排队，有时还需要民警出面维持秩序。聂元梓听着愈发妒火中烧。安子文不是不清楚聂元

梓在北大的处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于调走，为什么不肯帮忙？后来她听吴溉之说了这么一件事：吴的孙子想调进北京，吴还得先跟邓觉先讲，再由邓和安子文谈，事情才办成。聂元梓于是认定邓在从中作梗，邓成了她的又一号敌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从邓觉先的口里，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如拨云见日，聂元梓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里，检举安子文和邓觉先是“特务”。她甚至连吴溉之也不放过，尽管在她最困难时吴接纳了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她。就在她坐上陆平的位子后，还亲自带领北大红卫兵去吴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红卫兵把年老多病的吴拉到西单中组部门前批斗。

聂元梓把她当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以“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可惜我没能当面问她：你的革命难道就是检举揭发，就是把丈夫往死里整，就是残酷批斗、非法关押？如果再见到聂元梓，我更要问：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讲句真话？不再，虚伪？

六

五月，大落的聂元梓，大起了：靠着那张大字报，她一举成名。至今有人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授意写的，聂元梓坚持说没有阴谋，我相信写大字报是她的主意。“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陆平也该垮台了，她必须再加一根稻草，压断这只骆驼的腰。

但她绝不是个蛮干的人，整个策划过程处处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组进校，她带头揭发陆平，不仅得到康生的鼓励，还通过田家英直接送信给毛泽东。这次她又首先获得康生同意，大字报贴出去后，她立刻把底稿交给了康生。其间她不断向康生求援，说遭受围攻，处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报底稿传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聂元梓的目的达到了。当然不是没有等待中的焦虑：毛会怎么表态？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毛泽东认可了！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毛主席”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

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谁能说她跟毛没有共通之处：心地残忍，六亲不认，崇尚暴力，嗜权如命。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

### 【当事者说】

#### 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

• 聂元梓 •

贵刊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一文严重失实，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及名誉诽谤，仅举几例如下：

第一，牛文说：……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接见时，指示由我负责组建并用巴黎公社选举方式产生，领导校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

北大不存在以我为首的左派团队。1966年“5·25”大字报是哲学系尚未到农村参加四清的几位教员和干部，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根据北大长期在左倾思想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反右倾、社教运动……）中，群众的积怨而写的大字报。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写大字报的这几个人并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曾有人说：“当时我们都下去参加四清了，如果在校我们也会签名的，那就不是七人大字报了。”

江青、康生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讲过“张承先工作组走后，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话，但北大文革委员会不是“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成立的”，而是在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同志亲自领导下，于9月9日选举产生了42名正式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见《北京大学纪事》第651页）

第二，我没有叫姜同光给牛辉林打过电话，让他派北大红卫兵到我家撵吴溉之子女为首的在我家闹事的红卫兵。

我知道吴溉之的儿子与两个学生一天上午到我家来过，当时我不在家，回家后是保姆彩兰告诉我的。王梦兰也证明。此后，我再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吴溉之子女带领一伙红卫兵来我家闹事。我的儿子放学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见到这伙人。那就用不着让牛辉林用大汽车把他们拉走了。

第三，陈葆华不是我的秘书。她没有陪我到牛辉林的“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时是叫红卫兵联络站），当然没有我对他那长篇谈话。

其实牛辉林抄吴溉之家的全部情况，陈葆华早已向我汇报过了。她跟着去就是看管牛辉林不要出大问题的。当时吴溉之由儿媳（穿着军衣）搀扶着应对牛辉林抄家的行动。文件柜已经由他的单位查封，但牛辉林还要启封检查是陈葆华阻止的，红电话机已由单位停机，根本没有我叫“陈葆华同志让你半夜拉吴溉之到中组部门前的大街上批斗”的事。

第四，牛辉林说我让北大派人把吴氏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教育。我没有中央的电话也没有这种资格叫总理来管理吴溉之的子女。康生我从来不称他“康老”。

第五，牛辉林的文章把我写成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不仅偷走了吴溉之的古董古玩等珍贵物品，连笔、墨、纸、砚都偷。吴溉之的亲朋好友肯定都知道他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不写大字更不玩古董古玩。1968年军队抄家证明我家没有抄出一件珍贵的物品。牛辉林还说，刘亚楼将军送给吴溉之儿子结婚的贵重礼物“一只女手表”我从吴溉之手中拿走，故意摔坏后交还。纯属子虚乌有。

第六，牛辉林还说：“……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调离北大”，又说聂元梓“认识吴溉之老人后，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做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把我说得那么低三下四。这是牛辉林毫无根据的猜想。

吴溉之没有秘书，家中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司机、一个厨师。没有警卫人员更没有警卫军官。

第七，牛辉林说“老人带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的高级老干部回农村老家结婚度假的。这事只要问一下两个人的单位就清楚了。牛文写了很多有声有色的细节，好像他在身边看到了一样，其实都是虚构的。

第八，我从来没有说过吴溉之是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前方都是在彭总率领下与敌人战斗的，黄克诚不仅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战争中，无医无药，我的生命处于危在旦夕时，是他派军区吴部长给我开刀挽救了我。我怎么能说他和彭总都是大黑帮呢，而且我还与他夫人唐棣华同志一起工作，她是区委书记我是区委副书记，他俩都是我感恩不尽的领导人，有人这样的造谣诬蔑使我十分的痛心。

第九，“5·25”大字报不是我个人写的，牛辉林说的“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他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的‘5·25’大字报”。没有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也会产生，毛主席决定对“5·25”大字报的批示广播，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决定的，与曹轶欧无关。没有曹轶欧和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同样会被批示广播的。

2009年4月21日

□ 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